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五四爱国运动

李捷 编写 新华出版社



1.1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五四爱国运动

李 捷 编写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五四爱国运动

李捷 编写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29,000字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5011-0708-4/K·90 定价0.85元

目 录

一、山东问题和巴黎和会	(2)
二、火烧赵家楼	(9)
三、北京校园内外的波澜	(14)
四、新兴工人阶级的怒吼	(22)
五、一代伟人的崛起	(29)
六、群众大联合的胜利	(40)

1919年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笼罩着近代以来受尽耻辱的北京。

5月初，北京城各家报馆都在盛传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5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北京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xiè,泄〕那里得知，政府已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令其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蔡元培听罢心头一惊，立即把这个确切消息转告许德珩(héng,恒)、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噩耗迅速传遍北京大学校园，并向京城内外传播。

这天晚上，北京内城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灯火通明。千余名学生代表在这里集会。著名记者邵飘萍首先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时局。随后，学生代表张国焘、丁肇青、许德珩、谢绍敏等先后在会上发言。法科学生谢绍敏当众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在场代表声泪俱下，气氛十分悲壮。会议委托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并通过决议：（1）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2）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提前，行于次日举行；（3）通电巴黎专使，不许签字；（4）通电各省，5月7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大会一直持续到深夜11时。

在第二天出版的北京《晨报》上，以醒目的位置登出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向全国的通电：

“本会定于本月七日即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并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

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

“五四”前夕，中国的不少报纸都在重要版面上，赫然写道：

“外交大失败警耗！”

“山东问题之最后五分钟！”

此刻，长期沉睡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中国大地，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

这是北洋军阀丧权辱国的必然结果，也是各帝国主义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紧重新瓜分中国的必然结果。

一、山东问题和巴黎和会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由对山东问题的处置引起的。

山东，是我国北部的一个临海省份，其东部山东半岛伸入渤海、黄海之间，半岛两侧的胶州湾、威海、烟台、龙口等地，是设立军港和商港的良好地势。

德国对此早就垂涎〔xián〕三尺。1897年11月14日，它借着两名德籍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当地大刀会众杀害的机会，派兵舰攻占了胶州湾。此后，它又设法使这一强盗行径合法化。1898年3月，迫使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准将山东省胶州湾地方借与德国；准许德国在山东省建造胶（州）济（南）铁道，铁道左右各30华里的矿产，德国人有开采权。这样，整个山东省

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日本，对德国的势力在山东的扩张十分嫉妒，伺机插手山东。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夫妇乘车到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刺死。7月28日，奥匈帝国借机向塞尔维亚宣战。随即，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相继投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同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正式加入协约国。它卷入这场以欧洲为主战场的大战，其目的并不是要派兵远征欧洲，而是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抢占它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因此，日本在对德宣战的同一天，即派日军2万余人在山东龙口登陆。9月26日起，又令日军深入山东内地。11月7日，日军占领青岛，青岛德军向日本投降。这样，日本乘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只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它的长期野心，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全部权益都被日本所取代。

然而，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毕竟是巧取豪夺得来的。因此，它在进一步染指中国其他地区的同时，也念念不忘使其在山东的权益通过外交途径合法化。

1915年1月18日，即日本占领青岛两个月以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递交所谓“二十一条”。要求“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条约共分5号，第1号就提出山东问题，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

东的各项权益，并进一步享有新的特权。其余 4 号内容分别为：要求享有独占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权利；享有独占汉冶萍公司及其附近矿产的权利；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享有操纵中国政治、财政、军事和警察机构的权利，并把福建、江西、广东事实上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总之，“二十一条”的核心，是要取西方帝国主义而代之，把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

5月7日下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声称：“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5月9日，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命令外交总长陆徵祥在条约上签字。从此，5月7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巧合之处。4年之后，就在国耻纪念日来临的前夕，灾难深重的中国，又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民族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民众对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充满着强烈的愿望。许多人以为，德国的战败，标志着“公理战胜强权”，并从此给近代中国带来新的转机。1918年11月30日，北京学界为庆祝“公理战胜强权”，举行声势浩大的提灯游行，不少人前往北洋政府前总理段祺瑞宅邸表示祝贺。12月1日，公理战胜强权纪念碑改建工程在北京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破土动工。

在这样一种幻想情绪鼓舞下，美国总统威尔逊于大战前

夕提出的“十四点”建议，得到公众舆论的普遍赞同。在所谓的“十四点”建议里，威尔逊提出“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并组织国际联合会，“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这些动人的许诺，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难免一时误以为真。就连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也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中国诚实善良的亿万民众，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的召开。

事实胜于雄辩。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种种表演，使中国民众犹如沉睡的雄狮猛然觉悟，仰空发出久积于心底的愤怒的吼叫。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始。2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过程由“四人会议”控制。参加“四人会议”的有：英国首相劳合一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中国派出了5名代表参加和会，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席代表。

巴黎和会开始时，中国代表提出7项希望条件，主要有：废弃势力范围；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不久，在留欧学生的强烈要求下，中国代表在另一件提案里，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两件提案刚一提出，就被巴黎和会的最高会议挡了回来。理由是，这些问题超出了和会的权限。于是，和会给中

国留下的一线希望，便只有山东问题了。

1月27日，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在会上，中国代表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要求，遭到日本代表的坚决拒绝。下面是两国代表的一段对话：

中国代表顾维钧（北洋政府驻美大使）：

“日本为逐出德国势力于山东，……中国所当竭诚申谢；然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播将来纷争之种子，为本全权所不得不力争者也。”

对此，日本方面援引不平等密约作为反驳的依据。

日本代表牧野：“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属领；然而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

山东问题的首次讨论，终于草草收场。然而，在会下，日本政府加紧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fān, 帆〕奉命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质询，指责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

消息很快传出。这对以为“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民众说来，犹如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如梦初醒。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里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写道：“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

日本为证明独占山东已经过中国政府的允诺，却不禁泄露了密约的“天机”，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一时间，形成

以通电为主要形式的要求废除中日密约的运动。在山东外交商榷会的通电中写道：“驻日公使章宗祥擅与日本订胶济及高徐顺济路正约，违法卖国，莫此为甚，鲁省人民愤激万状。多请废弃以保主权。”

正当废除密约的呼声日益强烈的时刻，4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出席巴黎和会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的电报，声称：“我国和会提案，注重废二十一款及诸密约，……而国人竟有因受诱济私者，事同串卖，有若大逆，望率全国舆论一致严诛。”这封电报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社会的震怒。人们自然把攻击目标集中到签订这些卖国条约的北洋政府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等人身上。

4月11日，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离开日本时，300多名中国留日学生，赶到东京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地向车中扔去。

与此同时，巴黎和会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讨论在继续进行。

4月16日和17日两天，召开美、英、法、意、日五国会议。会上，美国代表首先提出“五国共管”山东的要求，以防日本独占。日本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道：“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对于中国问题由五国处置一层，不能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四国改取不干预态度。”

4月22日，召开全体大会。会上，威尔逊表示美国已无能为力，并质问中国代表：“1918年9月当时，协约军势甚

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英国首相劳合一乔治提出两项办法，要中国选择：“一，添中日协定凭据；二，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表示完全同意。

会后，中国代表向有关国家反复申述，企图改变定局，但均告无效。

4月30日，巴黎和会议定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完全满足日本的要求。至此，中国外交在和会上完全失败。

5月2日 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题为《外交警报警告国人》的文章，沉痛写道：“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并说：“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文章虽不便谈及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具体内容，但他的身份已使人们对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完全失败，确信无疑了。

在事实面前，人们惊呆了，人们发狂了。

5月4日，《每周评论》第20号刊登了陈独秀的时评，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北京大学学生更以辛辣的口吻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几个月来的幻想彻底粉碎了！国民在短暂的惊噩、震怒之后，迅即行动起来。

二、火烧赵家楼

1919年5月4日，是个星期天。

上午10时，一批学生代表在北京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研究举行示威游行的具体办法。这些代表来自北京的13所学校，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警官学校、医学专门、农业专门、汇文大学、铁路管理、法政专门、税务学校和民国大学。在热烈激昂的气氛中，代表们商议了下午“如何演说，如何散布旗帜，如何经过各使馆，表示请求之意，如何到曹汝霖住宅，表示国民不甘受卖之意”。会议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结束时已近中午。各校代表急忙返回，准备下午的游行。

初夏的北京，午后已有些燥热。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按预定计划，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高等师范和汇文大学到得最早。北京大学是这次示威游行的发起者，但在沙滩红楼操场集合准备出发时，遭到教育部和警察总监派来的代表的阻拦。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等人据理力争，驳得代表无言以对。最后，学生终于冲破阻拦，经北池子到达天安门广场。早已在广场上等待的其他12所学校学生，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这时，已是下午1时半了。

整个会场的中心设在天安门前。在乳白色的华表前，放着一张方桌，作为代表发言的讲坛。金水桥前，竖着一幅用长方形白布写成的挽联。上联是：“卖国求荣，早知曹瞒

遗种碑无字”；下联为：“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横批：“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白底黑字在骄阳的照耀下，格外醒目。北京大学法科学生谢绍敏昨晚写成的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也悬挂在天安门前，使会场气氛更为悲壮。

集会开始。北京大学代表登上讲台，宣读事先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危机一发，幸共图之”8个铿锵有力的大字，犹如声声惊雷，在广场上空回荡。随后，学生们还向围观市民散发了一份由北大学生罗家伦用白话文起草的传单。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学生的呼声感动了市民。不少人自动加入到学生的队伍中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

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受到中国巡捕阻拦。等待了两个小时之后，方准许推举傅斯年等4名代表前往美、英、法、日使馆。在英、法使馆。递交意见书的要求遭到蛮横拒绝。在日本使馆门前，学生代表被日本卫兵拒之门外，不许入内。此刻，北洋政府派来大批军警，准备镇压列队在使馆区外等候的请愿学生。代表受拒，游行被阻，学生们义愤填膺，怒火满腔。各校商定，找卖国贼曹汝霖算帐。这时候，负责总指挥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却也毫无效力。

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西口改向北走，经富贵街、长安

街、东单，再向北折，经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大羊宜宾胡同，来到赵家楼曹宅门前。这时已是下午4时半了。

这天中午，就在学生云集天安门的时候，曹汝霖正出席一个由大总统徐世昌举行的宴会。宴会在总统府举行，为的是给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席间，传来学生示威要求严惩卖国贼的消息。有人劝他们二位暂避一时，两人毫不介意，于下午2时半一同驱车回到曹宅。

愤怒的学生见曹宅大门紧闭，有三四十名警察守卫，便将手持的小旗纷纷投入院内，连声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并向守卫的警察宣传爱国道理。此刻，高师学生匡互生等5位同学，趁着大家高呼口号的时候，猛力跃上围墙的窗洞，砸毁铁窗，跳入曹宅。宅内的10多名士兵，先是受到墙外呼声的震慑，继而又被跳进墙内的学生的勇猛献身精神所感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膛内的子弹。5名学生乘机打开院门，围在外面的数千名学生和市民鱼贯而入。

学生冲入曹宅，首先进入大厅。厅内空无一人。学生们将厅内陈设的名贵家具扔出室外，并把墙上悬挂的日本天皇像摔在地上。随后，他们穿过花园，来到内厅。章宗祥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正在这里。学生扭住章宗祥，痛打一顿。章宗祥躺地装死，后来，在日本人保护下前往同仁医院住院治疗。

学生四处寻找曹汝霖，始终不见踪影。他们见到曹汝霖的父亲和小老婆苏佩秋，但未触及这几个人，便让警察把他们领走。据曹汝霖晚年回忆，此刻，他于仓猝间，避入一小

房（箱子房），未被学生发现。待学生散去，由人护送全家躲进六国饭店。寻不见曹汝霖，学生们气愤异常。有的学生在曹的内室放了一把火，顿时，曹宅火光烛天，浓烟滚滚。

这烈焰火光，说明了全中国民众对卖国贼的切齿痛恨，表明了中华民族对北洋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的强烈控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曹宅起火半小时以后，北洋政府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警总监吴炳湘率领大批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去，32名来不及走脱的学生被捕入狱，其中，有北京大学学生20名，许德珩也在此列。当晚，他们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32人拥挤在一个大炕上，东西两边各摆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个小时还要听看守的命令抬一下头，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送一桶开水，发给每人一个大窝头。后来，他们又被押解到警察厅，继续受到非人的摧残。

就在爱国学生成为北洋政府的“阶下囚”，受尽虐待和凌辱的同时，曹汝霖等人却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座上宾。

曹汝霖躲进六国饭店后，日本驻华使馆官员以及曹的亲朋部属，纷纷前往慰问。曹汝霖心中暗喜，有恃无恐，继续与爱国学生为敌。他指使交通部下令各电报局，禁止拍发学生的电报，但是没有得逞，因为学生的电报早已通过外国电报局拍发出去了。他还故作姿态，向大总统徐世昌提出“辞呈”，自称：“汝霖历办外交财政交通各事。问心无愧，被诬卖

国，万难忍受。”徐世昌深解其意，5月8日下令慰留，说他“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而学生“流言诋毁，致酿事端”，“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望他“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

5月4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家里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密商如何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在具体方针上，北洋政府内部出现分歧。执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等主张严厉镇压爱国运动，严办被捕学生：“段芝贵有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之语”。徐世昌和教育总长傅增湘等则主张采取怀柔政策，释放被捕学生，安抚民情。双方争执不下。据《新闻报》后来报道：“一部分官僚主张将所有参与此事之学校，全行解散者，更有主张只将各学校校长免职者，且有主张借此兴大狱者，议论纷纭，尚未决定。”

同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们纷纷开会，商讨如何营救被捕学生和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校长蔡元培出席北京大学学生大会，对爱国行动表示同情，但又劝说学生不要罢课。谈到被捕学生，他保证竭力营救。然而，愤慨已极的学生们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决定联络各校实行总罢课。当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宣告成立，下设总务、文书、交际、会计、庶务、纠察、讲演各股，上百名学生参加了干事会的工作。

北京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即将来临。